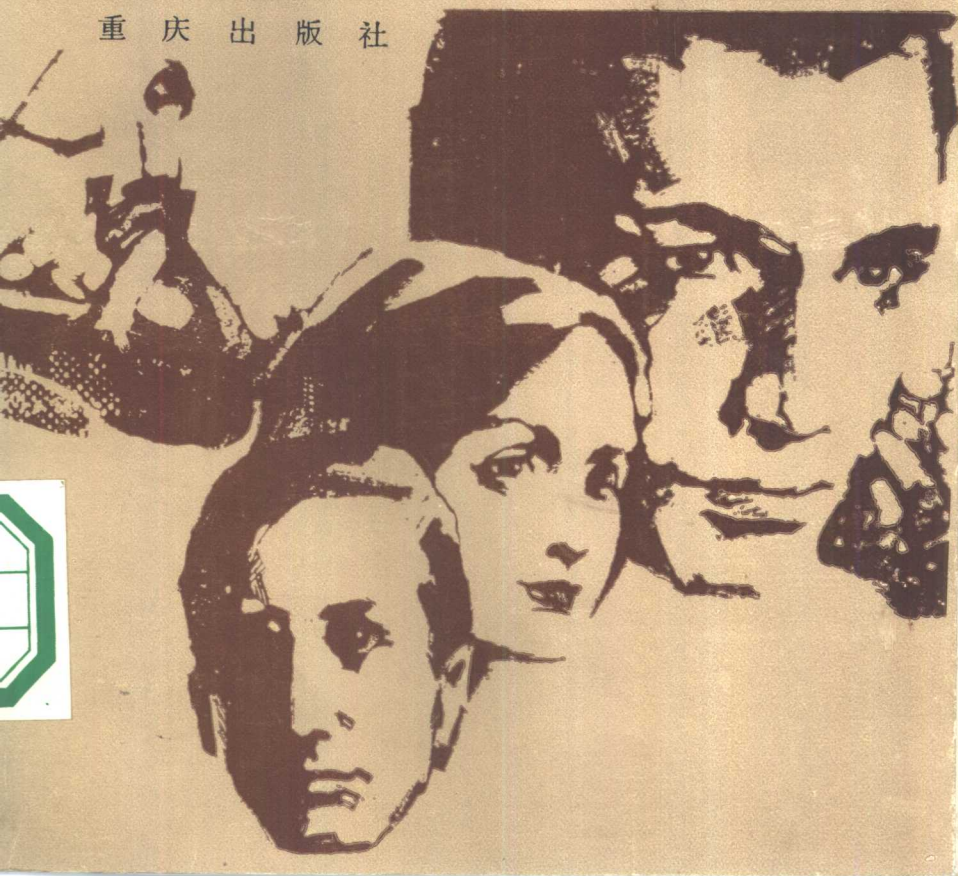




枫叶丛书

長夜漫漫

重 庆 出 版 社



长 夜 漫 漫

〔加拿大〕休·麦克伦南著

蓝 仁 哲 译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七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周定国

封面设计：钟晓旭

[加拿大]休·麦克伦南著 蓝仁哲译

长 夜 漫 漫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涪陵群众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3.375 插页2 字数287千
1987年7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9,700

ISBN 7-5366-0053-4

I·9

书号：10114·333 定价：2.20元

第 一 部 分

有些故事，读者需要有人循循领进，我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

那是寒冷的二月初，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冬天，傍晚我离开大学课堂，沿着游廊朝楼梯口走去。五点钟，这是那年冬天我最喜欢的时刻即将开始的时候。我喜爱晴朗冬天的蒙特利尔的夜晚，就要映着盖埃街角的晚星。沿舍布鲁克大街步行回家，然后在炉火前喝杯酒，接着用晚餐；餐后同妻子静静地呆在一起，再做点事儿，末了舒舒服服地睡一宵。这一晚，我会感到精神爽快。

我想得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的名字叫乔治·斯图尔特，出身于蒙特利尔的一个称得上古老的家族；但是家境贫困，即使现在，我认为自己既是蒙特利尔的子弟，更是萧条时期的产物，因为同许多朋友一样，我身上留下了它带给的伤痕。在萧条时期，这座莫测高深的迷人城市是个很糟糕的地方。

为了谋生，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，但只有搞广播一项给

我挣了点名声。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许多年，我就是电台的政治评论员，并且同时是几家杂志的自由撰稿人。要在像美国那样的大国里，有了我在加拿大的地位和名声。一定是很阔气的。但加拿大的人口稀少，干我这种工作的薪金也就微薄得多。从加拿大的东海岸到西海岸，知道我名字的人成千上万，但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比我富有。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经济上有保障，但也还过得去，起码不欠别人的债。

我从来没有安全感。除了愚昧无知的人外，在我这样年纪的人谁又感到安全呢？不少人认为我获得了成功，但在我自己看来，并不比那位希腊人更是幸运^①，他明知推上山顶石头又会滚下来，但每天照推样石上山。有的人认为我很冷静，但我心里明白，这并不是事实。我时常听人说我是位“成熟”的评论员，但我自己似乎从未有过成熟感。年青一代的人更显成熟，因为他们对三十年代一无所知。他们有足够的自信和无知使自己产生成熟的感觉，这是我喜欢他们胜过自己一代人的原因。几时出现过像我们那样的一群人？几时有过那么众多的人慷慨激昂，以天下为己任？几时有过任何一代，那么执着而又徒劳地去追求超乎自身能力的理想？

那个冬天我真的认为，自懂事以来第一次开始感到无忧无虑。我想我已经认识了自己，并与乖戾的命运达成了妥协；由于妻子的缘故我一向是听天由命的。我甚至开始遐想，从此会变得自信。我很喜欢在大学里谋得的半个教席，因为它使我有机会接近青年人。

^①指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，他生前是一位暴君，死后打入地狱，被罚推巨石上山，但每日推到山顶时，巨石又滚下，于是次日又从山脚下再推，如此劳苦不已。

——译注

战后的这些学生，在我眼里仿佛是世上陌生的一代。比起我们自己来，他们的思想更为开放自由，他们的情感更为坦荡无拘。同时，除非这个世界再一次乱套，他们会更为幸运。他们之中没有谁记得大萧条时期，没有谁知道希特勒称霸一世时的情景，也没有谁去为会成多余的人而伤脑筋。他们个个都期望找到工作，趁年轻就结婚建立家庭。这会儿我沿着游廊缓缓走着，听见他们在一天功课之后有说有笑，我也感到满心欢喜。一个学生走来问我一个课内的问题，我回答之后站在窗边，朝外眺望。

一个人应当保持记忆呢或是健忘的好？那个冬天，忘掉往事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容易。不知不觉就会进入梦乡，有时沉睡五个小时醒来，长夜像静寂的大海，我安详地躺着直到天明。我们住在蒙特利尔市中心，但我们在公寓里的家总是静静的，从未有置身闹市的感觉。而在这座北方城市的冬日黎明，一切更显得静谧；偶尔会听见擦着窗户的丝丝细声，那是在飘雪；通常总是万籁俱寂，只感觉到大自然的节奏，直到大街上有轨电车开始朝内日区驶去，这时，那声音仿佛是一阵阵风吹过古老的枯竭泽地。

一个人应当保持记忆或是健忘的好？蒙特利尔的有轨电车对我来说俨然是历史，当它们被公共汽车替代时，我真感到历史有可能随之而消失。每当我坐在黄褐色的座位上，听见售票员用英法两种语言反复说着“滨山街到了，滨山街到了，”我总要情不自禁地勾起回忆，历历在目地记起坐在同一路车上的种种往事，以及阅读世界各地——沈阳、查帕尔·亚的斯亚贝巴、格里卡、苏台德区、埃本埃米尔等地新闻的旧日情景。我们那一代人领教过多么可怕的地理知识？那

是一些我们从前为之充满热情和恐惧的地名？难怪我有时感到自己是幸存者。那些至今使我不寒而栗的地名，对于每周花三小时听我讲课的学生说来却毫无意义，他们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。

一个人能够通过专注于另一个人而忘却往事吗？那年冬天我对许多事满怀热忱，早上醒来便想着凯萨琳就是其一。黎明时分，她仍然在另一间屋里沉睡，我静躺着，她开始出现。我凝视墙头，她绘的画面渐渐清晰起来，她绘画时所感受到的乐趣也暖着我的心窝。我很高兴她发现这桩绝妙的事儿还不太晚，甚至为她能这样做感到骄傲。

我一直把凯萨琳当着生活的基石。还在孩提时代，我曾经有一阵子很虔诚，相信上帝在亲自关怀着我。但到了三十年代，我却对自己说：没有上帝。后来我得到了凯萨琳，担起了她的命运。而到了那年冬天，我感到自己有了担起她命运的信心，我暗暗在想：“没有上帝会有什么两样？倘若上帝存在，用得着担心他是否公正？”

凯萨琳的例子表明，我用不着相信上帝是否存在，是否公正。凯萨琳自幼患上风湿心脏病，这病放过了千千万万的人，唯独降落在她的头上；谈不上是她的过失，也不能说是她父母的罪孽。风湿心脏病是实实在在的疾病，既不能与之抗衡，也无法逃避；而在不久以前，还是无可救药的绝症。在过去的几年里凯萨琳几乎两次丧命，而在她尚存的日子里，利剑就悬在头上，她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中。她只能这样活着，我也一直提心吊胆。那年冬天，我终于感到骄傲，由于相信自己能在没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下这样做；即使这种力量存在，我也不敬重它，因为它让我

心爱的女人落得如此不幸。

正当我坐着观望窗外渐次黯淡的黄昏，无端地遐想——等候打电话的时刻你可以思绪万千！——我不由自主地记起一个人，一想到三十年代我就免不了回忆起他；对于我来说，他是三十年代的缩影。我快要把他忘记了，他已经离开人世十年，我已把他置之脑后，就像成年人将自己的长辈或父亲置之脑后一样。他并不真是我的父亲，但在三十年代的一段时间，当我在精神上和感情上都无所依傍，我确实曾经把他奉为我的父亲。

那位教授从电话机旁站起身，微笑着向我表示歉意，侧着头离开了房间。我走近电话机，拨了号码，立即有一个刺耳的声音用法语对我说：“爱德华七世旅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说，断定是看门人抄错了号码。我接着用法语说：“我叫乔治·斯图尔特，你那儿是不是有人打电话找我？”

“请等一下。”于是我被撇在那儿，空握着话筒等待。我一面等一面想，这样做是不是在浪费时间。不可思议，我认识的人之中会有谁住进这个旅馆。二次大战前，我认识几个常常光顾爱德华七世旅馆的人。这家旅馆曾经小有名气，一些有身份的人狂欢作乐之余爱在这儿住一宿，这份名声虽然不雅，但它不失为大战前蒙特利尔城里具有某种特色的地方。现在，这家旅馆的特色早被战争销蚀殆尽了。战争期间，旅馆把房间按小时租给一对对士兵和女人。因此，许多需要用盘尼西林的士兵一再向军医提起这家旅馆的名字，军事当局只好下令不准军人再进这家旅馆。现在没有谁再提起它，除非是有人在那儿被捕或者死在那儿。

我听见电话另一端有了声音，还喘着气，接着这声音讲

话了，我顿时毛发竖立。

“是乔治·斯图尔特吗？”

不可能！这个念头掠过我惊骇未定的心间。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绝不会有这等事发生。

“是，”我却听见自己的声音答道：“这是乔治。”

“真是你吗？真是我要找的乔治吗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“我是杰罗姆。杰罗姆·玛特尔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。“我一下就听出了你的声音。”

接着我开始浑身颤抖，脸色也变得苍白了。无论相不相信，心灵感应的现象确实存在着。杰罗姆·玛特尔正是我刚才记起的人，我一直认为他已经离开人世十年了。

二

我惊愕极了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只得老生常谈地问道：“你几时回来的？”

“你要是指蒙特利尔，我是今天早晨到的。我刚和哈里·布莱克韦尔通过话。”

又是一个与过去相联系的名字，我不禁暗暗叫道：“天啦！”

“他告诉了我关于你和凯特的事，我往你家里打过电话”。

“你是说，已经和凯萨琳通过话？”

“没有，叫乔治·斯图尔特这个名字的人太多了，我试了四个人都没成功，于是回头打电话找布莱克韦尔。他告诉

我，你在这个大学里有份工作。听我说，乔治——他说你们都以为我死了。”

“不错，我们是那样认为的。”

“凯特也那样认为吗？”

“她还能有别的想法？”

短时的沉默，接着他以一种未受惊扰的声音说：“可是，我却一直认为把信寄回来了呢。”

“从哪儿寄出的？”

“我到过——”又是短时的沉默，我听得见他深深吸气的声音，接着他说：“我到过俄国，到过中国。从中国出境进入香港，在那儿呆了一年以便恢复健康。我从香港写过几封信，没有一封退回过。我想过：要是凯特还活着，一定会大吃一惊的。我在心里坚信她还活着，我一直抱着这个信念。你们结婚多久了？”

我掏出一包香烟，朝电话机旁的桌上抖出一支，递到嘴边点火，拿打火机时，右手直颤抖。

“我这次回来，一定令人大吃一惊吧，”他说。

“也可以这样说。”

“哈里·布莱克韦尔一个劲儿地说：‘那是报上说的，你死了。’可怜的人，他总是报上说啥就信啥。”

电话里响起嗡嗡声，我接着说：“哈里近来干得挺不错。我们大家都小看了他，我们小看了不少人，他们在战后都干得不错。”

杰罗姆似乎没有听我刚才说的话。“难道我寄出的信一封也没收到？”他问。

“自一九三九年以来，没有谁读到过你一个字。”

电话里又传来嗡嗡声。

“布莱克韦尔给你说过我们是怎样断定你已经死去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他只是说，报上宣称我死了。”

“你对拉觉耶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？一个法国飞行员？拉觉耶上尉？”

他停顿了一会，说了声“没有”。

“嗯，”我说，“战争期间，这个拉觉耶上尉来过这儿，他说在法国的地下组织认识你。他告诉我们的事可不太妙。”

“他也许知道以另外名字出现的我，”杰罗姆说。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他说纳粹折磨了你两天，然后用一柄吊肉的钩子，把你的躯体悬挂在一个法国小镇的广场上。”

“报纸登的也是这些吗？”

“不，只说你在法国地下组织里被人杀死了。《新闻报》上还载了一则有趣的讣告。你是知道的，他们怎样看待你的政治观点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然后杰罗姆说：“是不是大家都相信这个受折磨被钩挂的说法呢？”

“是的”。

“凯特也相信吗？”

“相信。”

“那么”，他说，“几乎像是真的了。凯特也相信吗？”

“我已经说过她相信，杰罗姆。”

从窗口望去，我发现黑夜的阴影笼罩了带着松鼠脚印的雪地，这时又看见一点亮光划过雪地的一角，留下淡黄色的迹印。我感到周身麻木，如在梦中，不由自主地问道：“你去过哪些地方？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乔治，一下子说不清楚。俄国——中国——战争，——什么事都沾过。你可知道，一九三九年我们刚越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境内，我和西班牙人一道被捕，我的护照搞丢了。后来我在香港，读到一本讲法国集中营的书，作者叫阿瑟·科斯科拉。你读过那本书没有？”

“读过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该知道法国集中营的情形了。”我听见他呼吸的声音那么沉重，怀疑他是否病了。“当德国纳粹攻入法国时，法国人把我释放了，我只好与法国人一起转入地下，直到一九四三年被捕。他们没有杀我，因为我是医生。他们用船载着我东转西移，我逃跑时被抓住了，最后到了波兰。”

“在奥斯威辛吗①？”

“是的，”他简单地答了一句。

又是一阵沉默。我极力想象他此刻已变成什么模样，更觉得这一切难以相信。

“俄国人攻进波兰后，我被运往东部。俄国人也需要医生，在北极的一个地方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到西北利亚的一个城镇当了外科医生。他们答应过让我回家，但没有履行诺言，只是让我到了中国。说来话长，也很普普通通，成

① 奥斯威辛，波兰的一个市镇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希特勒在这里建立了臭名彰著的集中营。

千上万的人都有过与我类似的遭遇。我病倒后，中国人放我出境，他们让我去香港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以极为沉静的语气说，但这比任何激烈的语调都更有力：“我心中一直想着回家。我挣扎着活下来的目的就是回家，回到凯特和莎莉身边。”

我感到全身乏力，就像昏倒在地的人。

“你刚才说和凯特结婚多久啦？”

“我没说，不过已经九年了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然后他问：“她好吗？”

我这才恢复了些力气，因为这是我时常听人问起的问题。我在大街上要是遇见朋友，他们首先问的便是：“凯萨琳好吗？”我一开始谈起她，他的语气突然戏剧性地变成了医生的口吻。

“她现在究竟有哪些症状？”

我接着花了五分钟时间谈她的症状，他不时提问打断我。

我讲完之后，他问：“你是说发生过两次栓塞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注意到他语气中带着怀疑，我又补充说：“杰罗姆，她得到最好的诊治，杰克·克里斯托弗现在是她的内科医生。”

“我想应该他，我很高兴是他。”

从他反覆盘问我关于凯萨琳的症状看来，他仍然是当初的杰罗姆，起码在这方面是如此。我让他放心，要是不仔细瞧，谁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病。我问他是否了解医学上的最新发展。他说可能有些生疏，但他在香港一家医院干过一年，那个职位是通过一位胸外科医生的介绍获得的，多年前他在

爱丁堡与那位医生认识。我对他说，有一种新药对她很起作用，这种药在蒙特利尔还是首次用于她的病例，他坦率地承认还没听说过。一位教授进来找信件，有人在场，我抑制着没多说话。我望望窗外，已经完全黑了。

“莎莉好吗？”我听见杰罗姆问。

“她在上大学，最后一年。”

“乔治，多谈一点她的事吧。”

这时，我心里萦怀着一种想法：如果继续谈下去，我必须先知道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模样。他的年纪我知道——五十二岁了。但他度过的是多么不平凡的五十二个年头啊！他的皮肤还是白的吗？身上有没有伤痕？他的目光是不是带着蹲集中营的人所常有的神情？他的脸上有没有那种静穆的表情，这种表情有时是保持适度饥饿的人所特有的？

我努力向他描述莎莉的情形。

“小莎莉成了生物学家啦！”他惊奇地轻声微笑了一下。

“还记得她小时候我帮她安显微镜的事吗？她观察时说的那些话多有趣！”

他这样说着，我的眼睛火辣辣的，我差点儿哭了。他最后说的这些话令人回到过去，~~1941年，我离开他~~身影，他出现在萧条时期的那些夜晚的情景，~~又出现在我的眼前~~：那时，他在狂热的争论场合是中心人物，~~三四个年轻人聚集在公寓里~~，席地而坐，一边喝啤酒，一边议~~论政治、经济、~~谈论即将爆发的战争，讥笑鲍德温^①、张伯伦^②和~~大资本家~~。这会儿，他仿佛又出现在我面前，三十年代中期的杰罗姆·玛特尔，一副不

①鲍德温(1867—1947)，英国政治家，1923—1937年间连续三次出任内阁首相。

②张伯伦(1869—1940)英国政治家，1937—1940年任内阁首相

顺眼的英武模样；面膛绷着强健的肌肉，扁扁的鼻子，那是早年被摔破的结果，鼻孔同马一样仿佛直冒热气，头发硬得没法梳，只好蓄短发，方形的下巴，一张倔强宽阔的嘴，眼睛格外神采奕奕，闪着饥渴而又天真的目光，像孩子般羞怯，对弱小者和蔼可亲，对强者充满挑衅。他的相貌具有奇特的魅力，那是许多大胆的女性所企求的；在那些使我们感到压抑失望的不景气岁月，我们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了不起的人物。

“乔治”，我听见他又说话了。“你这会儿心里所想的，八成没说出口吧。”

“我想，你也一样”。

“她恨不恨我？”

“她从来没有恨过你。”

“那么，她真没有变！还是和当初一样！我在梦里看见的一切都是真的？她还谈起我吗？”

“没再谈了。”

我这样说了之后，有一长段时间的沉默。然后我听见他悄声地念道：“凯特！凯特！”接着我听见他啜泣起来，真可怜，我几乎忍受不了。我从不怀疑他爱她。

“乔治，我一定得见她一面。我得见见她 and 莎莉。”

我是一个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年轻的时候完全认为没有谁尊重我，理睬我。我年轻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我长得很笨拙，从来都对自己感到不满，年轻时还很胆怯。但是和凯萨琳一起生活，我成熟些了；我所干的广播这一行，教会了我如何控制声音。我现在意识到——由于我学会听自己的声音像听别人的一样，经常听广播录音使我能分辨音质——我

明白，我的声音宏亮而又低沉。

“你现在适合去见她吗？杰罗姆？”

“你说的‘适合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指的是心理和身体方面。”

他仿佛对我的问题感到吃惊。“我的体格像头牛”，他说。

“凯萨琳的可不像。”

他好像没听清我的话。“我知道这会使你感到突然和奇怪，可是，听我说吧，乔治——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些国家挣脱回来，告诉你，我仍然是医生，而且是一位相当高明的医生。不会出什么问题的。我一定得见她，乔治。我不见她，会是一个大错。我与警方不存在麻烦，也没有其他这一类的事。我在温哥华和警察局谈过话。告诉你吧，乔治，是凯特使我顽强活下来的。我相信她会明白这点。在一次梦中，她曾说：‘我从来没有离开你。’”

“那是什么时候她在梦中对你说的？”

“这有什么要紧？”

“我认为是要紧的。”

“嗯”——他似乎在努力使自己保持镇静——“嗯，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，但确实是真的。那些事——你只有亲身经历过，才会相信它们可能是真的。”又停顿了一下。“当然纳粹曾抓住我，也折磨过我；我双手带了残疾，有些手术我不可能再做了，不过这并不比想象的糟糕。除了手上的伤痕外，别处的都被衣服盖着。我不认为我的模样会吓人，没有孩子会停下来看稀奇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可是我并不明白，并不真正明白。对一个像他那样生活过十多年的人，我怎么能自以为是呢？

过了一会，我说：“杰罗姆，你必须理解，凯萨琳是个毫无保留的直性子，她的神经受过创伤，如果这个词用得不错的话。而且，过去九年里她一直以为你死了。”

这时我感到一股使我自己惊讶的激情：他活着回来，我从内心里感到宽慰和喜悦。

“她可能会拒不见你，”我说。

“我想她不会的，请原谅我这样说。”

“我今晚先和她谈谈，明天中午时分再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我不能今晚见她吗？”

“不，不能。”这时我突然想起钱的事儿，“有钱花吗？缺不缺钱用？”

“哦，钱！不愁，我在香港挣的钱还没花光。我一路乘船回来，一个子儿也没花，因为我是外科医生。从温哥华来的火车费倒花了不少，不过还有剩余。很快我就能自食其力的。”

“你打算住在蒙特利尔？”

“我自己还不知道要住在哪儿，连想都没想呢。情况变了，整个国家似乎都不一样了。”

“杰罗姆，请不要和我住的公寓通电话。明天上午十点我会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大楼办公室里。要不，由我打电话到你现在住的那个晦气的旅馆。无论如何我得先和凯萨琳谈谈，不能让她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听到你的声音。”我笑了一下，完全出于紧张。“你还记得这份广播差事是你给找的吗？”